

论象征的生成机制： 从分类到类比

王海洲

内容提要 象征的生成过程包含两个连续的环节。首先,分类机制建立起社会知识体系,并为象征物和象征本体的并置提供客观环境。在此环节中,人类的思维活动对并置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集体无意识”发挥着起点和基准的作用。其次,类比机制以象征物和象征本体各自具有的属性为类比对象,实现前者对后者的表达,从而完成象征关系的建构。类比机制所具有的有限性、间接性和漫射性等特征导致了象征意义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奠定了象征在人类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中的关键地位。

关键词 象征 生成机制 分类 类比 集体无意识

象征是人类社会得以构建的核心逻辑之一,在思维和文化两方面都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卡西尔直接指出“象征不是思维的纯偶然的外衣,而是思维的必然的和本质的工具。”^①里克尔(Paul Ricoeur)不仅持相似观点,还认为象征“希望对某种现代文化处境作出反应”^②。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干脆利落地认为社会的文化模式实质上就是一种“有组织、有意义的符号象征体系”^③。众多学者从不同侧面对象征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予以肯定^④。回眸百年来的象征研究,“象征/符号互动论”称雄于社会学中已逾八十载^⑤，“象征人类学”矗立于人类学中已有半世纪^⑥。此外,一些学者也不断探讨象征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⑦,他们拓展了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经典判断,正如亚伯纳·柯恩(Abner Cohen)所言,在任何情形下,人都具有一种双重属性:既是一种政治动物,也是一种象征动物。^⑧除此之外,在当今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象征更是被视作政治认同理论和多民族国家建设

实践中的关键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汗牛充栋的象征研究并没有形成普遍的共识,而是存在大量的歧见。实如埃科(Umberto Eco)所论“人们两千多年以来一直在谈论‘象征’(但如人所见,所谈论的象征如果不是错误的,那至少也是意义不清和过分冒失的),但严格意义上的象征观念并没有起作用:象征一词从未被命定,或者说没有构成一种基本的范畴。”^⑨象征本体论是象征基础理论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其主要内容包括象征现象的本质特征、基本结构和生成机制等。本文主要着眼于其中受关注极少的生成机制问题,希望藉此既进一步完善象征的基础理论研究,也对实践中象征关系的构建、识别和强化等提供新的理论支持。

大多数处理经验性材料的学者或将象征的生成过程视作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或围绕具体的案例分析象征关系的呈现和影响。此类分析实际上关注的是象征的外在功能(function),而非其内在机制(mechanism)。外在功能侧重于象征作

为一个整体概念所具有的实际作用,内在机制则关切象征本身作为一种由象征物和象征本体(如长城和中国)所构建起的关系,基于何种原理以及如何构造起来。象征的生成过程由象征关系双方的“并置”(juxtaposition)和“表达”(stand for)这两个连续环节构成,它们分别由分类机制和类比机制来实现。^⑩

在第一个环节中,并置指的是象征物和象征本体如何作为一组事物被遴选出来,随后置于一种关系中进行衡量。借用和发展卡西尔对符号的要求,并置强调的是象征关系的构建者和接受者必须能够同时处理关系双方的结构和规则。^⑪并置环节主要依靠分类机制完成。分类基于社会结构的逻辑确立起一种知识体系,不仅有助于识别万事万物,也为象征物和象征本体的并置提供客观环境。分类同时亦是人类的一种主观性的认知活动,“集体无意识”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既是识别万物的思维原型,也藉由其与象征之间的特殊关系,成为并置象征关系双方的基准。

在第二个环节中,象征物和象征本体间的表达关系主要由类比机制来实现。类比是象征关系得以形成的关键,它从象征物和象征本体中分别抽离出某种/些具有类似性、同源性或接近性的属性(包括事实和价值等),由此建立前者对后者的表达关系。简单来说,象征物(A)和象征本体(B)各自拥有众多的属性,分别为(a₁、a₂……)和(b₁、b₂……)。象征关系的表述则为:a_n之于A正如b_n之于B。类比机制的有限性、间接性和漫射性等特征是最终呈现出的象征意义具有复杂性的主要原因。

象征的分类机制

象征是社会中两种不同范畴的事物之间的表达关系,这种关系建基于两个条件之上。首先,将社会中的万事万物识别出来,使得每种事物作为“概念”与“形式”的叠加具有独一无二性。其次,从万事万物中将象征物和象征本体作为一对具有表达关系的事物择取出来。这两个条件的达成皆需借助于社会性的分类活动。

分类活动对于社会本身的形成至关重要,通

过它才能先划分出万千事物所属的范畴,然后藉此建立起一套相对完整、人所共享的知识体系,它在宽泛意义上包括了文化现象的所有内容,如语言、习俗、制度和法律等等。在这一体系中,所有的事物都各具其名、各安其位。事物范畴的划分和知识体系的建立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但都严格遵循着某种特殊的逻辑。这种逻辑与社会组织自身结构的方式密切相关。如涂尔干和莫斯基于澳大利亚部落社会图腾制度的研究指出:“最初逻辑分类就是用社会群体所采用的形式以及它们在空间中的确定位置来构想的……人类群体是环环相扣的:次氏族组成氏族,氏族组成胞族,胞族又组成部落。所以事物的分类也就采取了同样的秩序。它们在跨度上有规律地缩小,从属到种,从种到变种,如此等等。”^⑫简单来说,一种社会结构所具有的普遍秩序,往往与该社会的知识体系之间呈现出高度的对应性,对该社会中万事万物的识别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涂尔干和莫斯在社会分类方面的开创性研究以及后继者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深入挖掘,大多依据于特定社会或族群的经验,在其中社会结构发挥着重要影响。当考量多种社会间的经验差异时,分类的影响因素则有所变化,如有些学者认为是文化和历史,另有些学者则倾向于基因等生物性因素。^⑬无论是何种因素占主导作用以及无论在何种形态的社会中,这些影响因素都最终作用于一种稳定而共享的社会秩序的形成。

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社会分类机制所建立起的社会秩序及其知识体系对万事万物进行了识别和定位。象征关系双方作为两种不同范畴的事物^⑭,自然也接受这种社会秩序的制约,这便是社会分类成为象征关系得以生成的基础机制的主要原因。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社会分类机制或者说社会秩序对象征关系双方的并置所产生的影响。

首先,象征物和象征本体的并置不是随机的,有其必然性。特殊的社会秩序以各种方式约定了有些事物只能与某些事物并置,以及有些事物绝不可与某些事物并置。通过这种约定,任何社会都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广博的“象征池”,游弋其

间的每一条“象征之鱼”都由象征物和象征本体构成,社会秩序的特殊法则在两者之间充当黏合剂。从知识论的角度来说,可以表述为:象征关系双方的并置必然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其次,这些“象征之鱼”受到了社会主体的广泛承认,这便是并置的普遍性。无论是何者在何种目的上利用象征,都以接受象征物和象征本体之间的表达关系为前提。即便是在对象征的各种层级的争夺中也莫不如此。在此,“社会”概念表现出了一贯具有的弹性,它可以大到“全球社会”,小到“部落社会”。于是,具体的“象征之鱼”只能生活在某些尺度的社会共同体中,决定它们生存范围的是并置双方作为一种“知识”在共同体中的共享程度。

当“社会”规模小到一定程度,如“秘密社会”时,特定的语义学意义上的“话语秩序”而非普遍性的“社会秩序”将成为并置的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这种话语秩序由具体象征关系的表述者和受众共同构建,高度依赖言语表达的具体意义。它拘囿了两物之间的表达关系,使之不能为社会秩序所规定或承认。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语用学意义上将这种话语秩序理解为一种“狭义的”社会秩序。不过,无论是社会秩序还是话语秩序,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分类所形成的知识体系。

综上所述,在象征关系得以生成的第一个环节,即象征物和象征本体的并置环节中,社会性的分类活动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不仅安置了所有事物,而且为象征关系双方的第一次“对位”提供了基础性的规定。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所关注的象征关系内在的分类机制与罗德尼·尼达姆等人所提出的“象征分类”概念全然不同。后者针对的是不同分类系统之间的象征关系,如“左与右”的位置系统象征着“女与男”的性别系统等。^⑮虽然他发现的平行分类体系(类别之间是对等或对立的关系)的确补充了涂尔干等人的垂直分类体系(类别之间是递增或递减的关系),不过既没有呈现出“象征的形式”,也不属于真正的“分类”。^⑯确切来说,尼达姆关注的是“象征性分类的功能”。这实际上是新涂尔干主义者们在象征研究中的共同取向,即强调“象征的归类方

法”^⑰在处理社会性问题上的重要性,对象征关系的生成问题则略而不言。

分类机制的认知性基础:集体无意识

分类活动不仅需要客观性的社会结构为之提供特殊的逻辑指导,同时还依赖于分类者“理念中的主观要素”^⑱。无论是世间万物的识别还是象征关系双方的并置,都可以被视作人类的一种认知性行为。不过,这种认知的主体并不是微观的个人,而是作为人类群体之实体化结果的宏观社会本身。在此意义上方能正确理解玛丽·道格拉斯所言的“分类的活动是一种普同人性”^⑲,并且不至于对涂尔干否认人的心灵在社会分类中的作用的观点吹毛求疵。对于在分类活动中承担认知任务的社会性思维而言,其包括的内容无疑极为丰富,但最为重要的角色之一是作为认知基础的思维原型,即“集体无意识”。它既是识别事物的思维起点,也是并置象征关系双方的基准。

集体无意识之所以能够在社会分类活动中占据起点地位,与其基本定义有着直接的关系。弗洛伊德首先将“无意识”打造成一个深刻的学术概念,但真正让“集体无意识”成为理解社会秩序的重要术语的是荣格。荣格使用“原型”或“原始意象”的概念来替代弗洛伊德所言的“远古遗迹”,并指出“像本能一样,人类心灵的集体性思维模式是天生的、遗传而来的”,这种原型能够“创造出影响整个民族和时代,并打上其深刻烙印的神话、宗教和哲学理念”。^⑳对于荣格而言,集体无意识代表着一种由人类的过往历史所决定的、具有普遍性的共享经验,它是人类认识世界、理解自身的关键所在。列维-斯特劳斯补充了荣格的观点,认为集体无意识的力量不仅来自于经验性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其“形式”。他在阐释“野性的思维”时指出,这种作为具有原始意象的思维类型能够折射出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原则(形式),正是这一特征给予其跨越时间长河的力量,如现代社会中的“爱国主义”情感便是野性的思维的结果。^㉑两者的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集体无意识是人类知识体系的基石。

集体无意识能够对象征物和象征本体的并置

产生影响,则源于其本身与象征之间的莫逆关系。荣格认为,象征与符号的最大区别之一就在于其具有难以捉摸的意义,他将之称为象征的“无意识”层面。同时,由于“最重要的象征……在其性质和起源上都是集体性的”^②,因此集体无意识就是社会象征的天然内生物之一。作为一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早就提出了相似的观点:“神话思维”这种集体思维的原型之一是“极为发达的象征概念王国的基础”^③。两者实际上都是基于一种历史视野,在社会功能意义上讨论集体无意识对象征关系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从中发现的“并置基准”需要在一种客观性的社会背景中予以理解:集体无意识并不广泛而直接地参与象征关系双方具体的并置活动,它主要对社会生活中的重大象征关系产生影响,在象征关系的设置和调节中充当着最为基础性的标准,一旦有所撼动就很可能导致整个社会象征系统的变动乃至崩溃。这一现象在人类族群文化的历史变迁中并不罕见。

拉康为我们在主观性的性情背景中理解集体无意识充当并置基准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观点。他提出了“象征界”这一概念,用以指成熟的社会人所处的一种认识阶段,在其中主体基于“语言功能”认识世界、处理与外界的关系,由于语言总是指代着其自身之外的其他东西,因而可称之为“象征秩序”^④。拉康虽然与荣格相似,都认为无意识存在于象征秩序之中,但观点形成的路径完全不同。拉康重塑了索绪尔的语言结构,认为能指(形式)而不是所指(概念)才是最为重要的,主体只能掌握能指,而不能掌握所指。由于主体对能指的掌握建立在对外在世界的能指系统的习得基础之上,且这一能指系统又是按照已经出现的能指而被结构的——这是一条游移的能指链条,因此主体把握能指的能力极为有限。拉康将这种主体不可把握、但又影响着主体认知的外在能指系统(实际上就是语言或象征秩序)称作“无意识”,主体正是由这种无意识所“预设”^⑤。基于拉康的观点,象征关系双方的并置有赖于人类有限的认知能力,尤其是从象征物的能指游移至象征本体的能指的能力。举例来说,主体是无法掌握“长城”和“中国”的完整概念的,唯有基于某种/

某些特征(能指)“识别出”两者并将两者关联在一起,才能建立起两者的象征关系。

荣格和拉康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对于理解象征的分类机制都具有积极意义。荣格让我们关注到分类的时间维度,即人类社会的历时性经验的沉淀是并置象征关系双方的客观背景。拉康则提醒我们另外存在着一种分类的话语维度,即分类的标准受制于那些隐秘地操控着我们的言说秩序(他所言的“大他者”)。这种具有共时性特征的秩序还限定了人类并置象征关系双方的基本能力。在象征关系的生成中,荣格的反思展现出了情境力量(社会性的客观要素)具有根深蒂固、乃至决定性的影响力,拉康的观点指明了性情力量(人自身的主观要素)受到了全方位的掣肘。

集体无意识在荣格那里潜藏过深,在拉康那里则是无从把握。就“捕捉”集体无意识而言,社会学给出了一条解决之道:直面经验本身。乔治·米德借用冯特的术语“姿态”(gesture)以指代在社会情境中为人们所共享的、具有意味且能够表意的符号。这种姿态需要会同内在的心灵和外在的社会来共同处置对象,它对把握姿态的主体提出了两方面的要求:一是理解社会角色之间进行沟通的原则,这种原则使得他人与自我,或者说社会性的“客我(the me)”与生理性的“主我(the I)”实现认同。二是理解“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对某种特定情境所做出的共同反应”,即“制度”,因为是社会制度组织起了个体的一切活动。^⑥这两点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象征的分类机制都有价值,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象征分类依赖于多元化的标准,再一次强调了象征关系的生成机制中情境性因素和性情性因素相统合的必要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象征关系的高度复杂性,不过,象征关系的复杂性并不仅仅由分类机制所导致,类比机制在其中发挥着更为强大的影响力。

象征的类比机制

分类机制旨在解决象征物和象征本体为何能够构成象征关系(如中国文化决定了长城可以与中国并置,但不可与日本并置),而不能回答两者

如何构成象征关系(如长城在何种意义上象征着中国)。双方之间的表达关系得以确立,需要通过类比机制才能完成。分类机制处理的是两种不同类别中的事物,而类比机制处理的是两类事物中各自蕴含的种种属性(attributes)。雅克·朗西埃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类比机制在象征关系中的主要作用,即“证明一种更为基本的共同归属关系,证明一个共同的世界”^{②7}。但这一表述还不够具体和精确,我们通过类比机制的两种最为常见的表现形式加以说明。

一是局部类比。在象征物 A 和象征本体 B 中提炼出来的不同属性 a_n 和 b_n 具有相似、同源或接近等特征,由此基于 a_n 和 A、 b_n 和 B 的种属关系实现 A 对 B 的表达。在局部类比中,强调的是属性本身的内容和形态。例如,从长城的“雄伟”和中国的“伟大”具有同源性上出发,确定长城和中国间的象征关系。二是整全类比。在确定 a_n 和 b_n 的对应关系后并没有停止,而是延伸到 A 和 B 所具有的其他属性之中,由此 A 和 B 作为统合多种属性的结构形成了广泛的对比。整全类比充分发挥了类比作为一种推理逻辑所具有的能力。仍以长城和中国为例,当“雄伟(的建筑)”和“伟大(的国家)”形成对应关系后,类比继续进行,以在长城和中国之间寻找更多可堪对应的属性,如“牢固(的墙体)”和“稳固(的国防)”、“浩大(的工程)”和“强盛(的国力)”等等,最终在多属性类比的支持下,长城和中国作为聚合这些属性的结构本身,各自以一元实体的形式在形象上实现了高度的叠合:长城“就是”中国,任何针对长城及其各种属性的言行就是针对中国这一完整政治实体的言行。通过整全类比实现的象征关系往往要比局部类比更加深刻和牢固。

无论是在局部类比中还是在整全类比中,都可以发现类比机制的三种特征:有限性、间接性和漫射性。通过对这些特征的阐释,既可以观察到类比机制运作的不同方式,也可以发现类比机制正是象征意义往往具有复杂性的根本原因。

首先是类比的有限性。象征关系中的类比总是“以偏概全”的,即基于两物包含的无数属性中的某些部分间的可比性,实现一物对另一物的表

达。埃科将之理解为类比的充分性,认为这是导致象征的意义“含混暧昧”的主要原因。^{②8}另有一些学者认为类比的有限性体现在事物之间的关联往往取决于诸多不可测的偶然因素,象征就此而言作为一种“随机联想”展现出复杂的意义。当然,这种“随机性”更多的是难以把握,而非完全无根据地随意而为。造成类比有限性的原因有很多,上文涂尔干、荣格和拉康等人的观点都已经提及了其中的关键:社会秩序及其知识体系的限制、思维原型的潜在影响以及人类对所指的无能为力和对能指的有限利用等。这些因素虽然在不同的方面制约着事物之间不得随意建立象征性的联系,但已经为象征意义的生成提供了一个足够广阔的空间。

其次是类比的间接性。如果说类比的有限性关涉的是象征意义的广度,那么类比的间接性关涉的是象征意义的深度。康德早就将象征视作一种“间接的符号”。符号作为具有某种特性之物寻求直接复制概念;象征则不具备特性,它只能先诱发直观(感觉),然后通过直观再诱发概念。^{②9}也就是说,象征不能直接地呈现出概念,它受限于诱发感觉的过程和能力。不过正是因为这种限制,使得象征与概念之间的联系产生了更多的可能性。康德的认知符合大多数学者对象征和符号关系的看法:象征既享用了符号的躯体,又有符号所不具有的丰富内心世界。类比的间接性意味着象征关系双方的属性之间的类比并不一定能够被清晰地勾勒出来,有时需要更为深入地理解主体的思维过程及其所处的社会背景,才能把握它。

最后是类比的漫射性。这一性质指的是进行类比的属性之间的一对多的关系,我们也可以将之理解为类比机制的“简单化”。对此,人类学家们已经为我们贡献出了很多经典的案例,用以说明一些简单的象征物何以能够产生广泛的影响力。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认为关键的原因在于:“简单的形式能够与普遍化的特性相联系。”^{③0}换言之,正是象征物中所遴选出的简单属性,能够“漫射”到普遍的社会秩序及其观念体系之中,从而“激发”出尽可能多的象征本体。同时,由于简单属性的漫射能够形成一种复杂的象

征关系,更增强了这种简单属性及其背后的象征物的漫射能力——人们不仅争夺对这种象征物及其属性的支配权,而且会主动令其与更多的象征本体产生联系,以构造出一种由自己所掌控的象征之网。以圣女贞德为例,她因其复杂身份被视作一种极为有力的象征,引发了持不同立场的各方的激烈争夺。^①

类比机制的有限性指出了类比属性的遴选受制于社会实践和认知活动,这两者因其包容万千而看似有限、实则无限。间接性意味着类比并非总是一目了然或者意义明确,它对象征关系的塑造者、接受者和所处环境都提出了要求,需要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理解。漫射性强调两物用于类比的属性之间的对应并不是唯一的,即一物的某一种属性可能对应另一物的多种属性。这三种性质共同决定了最终生成的象征关系具有复杂的意义,而这种复杂性正是象征“力量的源泉”^②。

结 语

分类机制和类比机制在象征关系的生成过程中承担着不同的任务。首先,基于社会结构的基本逻辑,分类机制所建立的知识体系成为象征物和象征本体并置的客观环境,同时,人类的思维活动亦对并置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集体无意识”在其中发挥着起点和基准的作用。其次,依靠作用于象征关系双方的属性的类比机制,实现了象征物对象征本体的表达,从而最终构建起一种象征关系。无论是点对点的局部类比,还是由点及面的整全类比,基于类比机制的有限性、间接性和漫射性,象征意义表现出了一种复杂性的特征,并由此奠定了象征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勾勒出象征关系的生成过程并非无足轻重,它有助于在本体论意义上完善对象征概念的理解。同时,在关于象征的种种实践(如构建民族国家认同和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等)中,此项理论研究既有助于更好地为象征本体选择恰当的象征物,也是厘清复杂的象征意义的关键所在。当然,越是基础性的问题,所涉及的研究内容就越恢弘。本文囿于篇幅只能有选择地从一些学科的相关研究出发,简略地解释象征的生成机制的基本结构和

工作原理。我们相信,不同学科范畴中对象征现象的剖析,都对深化此项基础性研究大有裨益,亦是不断拓展象征研究之范畴和适用性的必经之路。

①②③翁贝尔托·埃科《符号学与语言哲学》,王天清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50、277、269页。

④保罗·里克尔《恶的象征》,公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7页。

⑤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页。

⑥如对格尔茨提出批判的约翰·汤普森(John B. Thompson)也认同“文化现象都是象征现象”,只是应该从象征形式的“结构性社会背景”出发研究文化。参见约翰·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钰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页。此外,尼尔·波兹曼认为“整个文化……是以不同象征方式展开的多次会话的组合”。参见波兹曼《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章艳、吴燕荃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大卫·莱汀指出“语言、历史、宗教或表征等方面的共享象征(shared symbols)”作为文化的“外生性因素”,是文化的“工具性面孔”(instrumental face)。参见David D. Laitin, Aaron Wildavsky,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Preferenc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2, No. 2, 1988, pp. 589 ~ 597.

⑦Norman K. Denzin,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and Cultural Studi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2, Preface, xiv.

⑧瞿明安等《象征人类学理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5页。

⑨Murray Edelman, *The Symbolic Uses of Politics: With a new Afterword*,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5; Charles Elder and Roger Cobb, *The Political Uses of Symbols*, New York and London: Longman Inc., 1983.

⑩亚伯纳·柯恩《权力结构与符号象征》,宋光宇译,台北金枫出版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21页。

⑪首先,本文创设“并置”一词是为了较为精准地描述分类机制所处理的形象;其次,本文作出严格界分的分类和类比是符号/象征研究中两个颇为常见的概念,通常分别存在于两种语境中:与前者相关的是讨论不同类型的象征现象,与后者相关的是讨论何种范畴的事物可以用于象征类比等。参见爱德华·萨丕尔《萨丕尔论语言、文化和人格》,高一虹等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31~336页。

⑫参见Ernst Cassirer, *The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s, Volume one: Language*,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 p. 92.

⑬涂尔干、马塞尔·莫斯《原始分类》,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88页。

⑭Morris W. Forster, Richard R. Sharp, “Race, Ethnicity, and

- Genomics: Social Classifications as Proxies of Biological Heterogeneity”, *Genome Research*, Vol. 12, No. 6, 2002, pp. 844 ~ 850.
- ⑭从语言学角度来说,象征双方必须以语言形式表达出来,而语言正是“社会作用的产物”。引言参见菲尔迪南·德·索绪尔《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 ⑮Rodney Needham, “Right and Left in Nyoro Symbolic Classification”, *Africa*, Vol. 37, Iss. 4, 1967, pp. 425 ~ 452.
- ⑯Gregory Forth, “Symbolic Classification: Retrospective Remarks on an Unrecognized Inven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Vol. 16, 2010, pp. 707 ~ 725.
- ⑰杰弗里·亚历山大编《迪尔凯姆社会学》,戴聪腾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 ⑱Frederick L. Bates and Walter Gillis Peacock, “Conceptualizing Social Structure: The Misuse of Classification in Structural Modeling”,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4, No. 4, 1989, pp. 558 ~ 570.
- ⑲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黄剑波等译,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序言第9页。
- ⑳㉑卡尔·荣格《象征生活》,储昭华、王世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184~186、166页。
- ㉒列维·斯特劳斯特《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27页。
- ㉓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2页。
- ㉔参见肖恩·霍默《导读拉康》,李新雨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4~46页。
- ㉕Jacques Lacan, *Ecrits: the first complete edition in English*, New York &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6, p. 712.
- ㉖乔治·米德《心灵、自我和社会》,霍桂恒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279、288~289页。
- ㉗雅克·朗西埃《图像的命运》,张新木、陆洵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6页。
- ㉘参见康德《实用人类学》,邓晓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
- ㉙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赵玉燕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04页。
- ㉚王海洲《暗箭:论政治象征的三重争夺》,《江海学刊》2010年第5期。
- ㉛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王海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

作者简介:王海洲,1978年生,政治学博士,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赵涛)

ABSTRACTS

(1) On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Symbol: from Classification to Analogy Wang Haizhou • 5 •

The generation process of symbol includes two continuous sections. First , the social knowledge system created by the classification mechanism provides an objective environment for the juxtaposition of a symbol and its object. In this section , the human mind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juxtaposition , especially in which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acts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criterion. Second , based on the analogy mechanism between the attributes in a symbol and its object , the symbol proper stands for symbol object , therefore establishing a symbolic relation. The finiteness , indirection and diffuseness of the analogy mechanism lead to the complexity of symbolic meanings which sets up the key position of symbols in the human soci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life.

(2) In What Sense Did Marx Create Tradition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Li Dianlai • 42 •

Marx created a unique tradition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different from the mainstream of west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represented by liberalism since modern time ,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three great transformations: from civil society to human society on foothold , from natural argument to social argument on way of thinking , and from value of this shore to value of the other shore on normative content. These three transformations , not only demonstrate that the tradition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created by Marx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one since Hobbes and Locke , but also demonstrate that the former is developed on a relatively deep and high point of view in contrast to the latter.

(3) Dimensional Frame and Path Choice of China's Structural Reform of Supply – Side: On the Coupled Perspective of New Classical Economics and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Hua Guihong Li Zilian • 74 •

China's structural reform of supply – side is to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and construct sustainable mechanism of economic growth , by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supply system. From the view of dimension frame and promotion path of structural reform of supply – side , transformation of factors is the base , whil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is the key and institution reform is the core.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factors is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factors from quantitative expansion to quality improvement , the capital factors transforming from inefficient accumulation to efficient allocation , and the change of resources and energy from extensive input to intensive utilization. To promot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is to improve the educational quality because education is the source , to perfect property the right system as to it is the guarantee , and to increase resident income because it is the pull. To promote institution reform , it is obliged to deepen the innovation of income distribution to improve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 to deepen the reformation of rural land to release bonus of production factors , and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fiscal revenue to enhance vitality.

(4) Oil in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Economic Security: 2016 Monitoring and 2017 Warning

Gu Haibing Zhang Shuai • 81 •

Petroleum play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national economic security. From the connotation of economic security , oil dependence degree and days of 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s meeting the consumption can measure the oil impact on national economic security from two aspects of external risks and internal resisting risk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il dependence degree of the situation is worsening , the security score from 31.6 in 2016 to 28.4 in 2017 , days of 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s meeting the consumption has improved every year , scoring points from 89.6 in 2017 to 91.8 in 2016. However , overall , the impact of oil on economic security has deteriorated in the years , with a score of 53.2 points in 2016 to 51.1 in 2017. Therefore , it is obliged to take a variety of measures to make the oil impact on economic security gradually improved.

(5) Structural Constraint and Subjectiv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Workers' Professional Identification

Yang Faxiang Ye Shujing • 101 •

Social workers are important participants of social governance , and they are also the major providers of social services. What's more , their professional identity is contributed 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industry and the advancement of social construction. The professional cognition and practice of social workers reflects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 speci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social work in China from one side. As a strong external driving for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 the governments and academia are both power and constraint , torturing the autonomy and subjectivity of social work industry. It is an important proposition worthy of deep thinking that how it is possible for sustaining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industry if the external impetus thrust weakens.

(6) On Economic Right Qiu Ben • 134 •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livelihood is the economy , the core of civil rights is economic rights , and